

大战终结：撒哈拉以南非洲 政治暴力变化的模式*

[美国] 斯科特·斯特劳斯

内容提要 与通常的假定相反，撒哈拉以南非洲大规模、有组织的政治暴力在发生频率与烈度方面都在下降，而且非洲也并非唯一易爆发战争的地区。21世纪头十年后期的非洲内战频次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半，而且战争的特点也发生了变化。当代非洲的内战往往是小规模的、发生在边远地区，有时跨越多国、涉及派系化的叛乱者，叛军往往不能占有重要领土或首都，大规模杀戮民众的事件也在下降。非洲其他形式的政治暴力正在增加或继续存在，包括选举暴力和由土地或水等生存资源争夺引发的暴力。冷战后的地缘政治转型是非洲内战频率与特点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非洲战争 政治暴力 选举冲突 资源冲突

作者简介 [美国] 斯科特·斯特劳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与国际问题教授。

非洲国家独立50周年纪念为我们从多个维度评估非洲的后殖民经历提供了重要的机会。鉴于殖民国家的人为强制性、殖民边界的分裂性以及独立进程的突然性，大规模政治暴力成为非洲国家独立后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自独立以来，许多非洲国家目睹了太多的内战、大规模杀戮以及其他形式的政

* 本文是作者在高露洁大学（Colgate University）彼得·舍利尔纪念活动的演讲稿基础上修改而成。See Scott Straus, “Wars Do End! Changing Patterns of Political Violence in Sub-Saharan Africa”, *African Affairs*, 111/443, pp. 179 - 200, March, 2012. 本文的编译刊登得到了作者授权，特此致谢。

治暴力，乃至许多新闻观察家声称，非洲是世界上暴力最突出的地区。^① 有人将其描述为混乱而永久的战争，永无止境并且像病毒一样在非洲扩散。^② 学术文献的描述也呈现了一幅充满大规模暴力的非洲大陆画面。^③

本文将批判性地评估关于非洲政治暴力的一些假定，同时主要回答4个问题。第一，非洲冲突与大规模杀戮的主要变化趋势是什么？第二，就此类政治暴力的频度与持续时间而言，非洲是否不同于其他地区？非洲一直是此类暴力冲突发生最多的地区吗？第三，撒哈拉以南非洲内战与其他形式政治暴力正在发生什么变化？最后，如何解释暴力尤其是武装冲突模式的变化？这些问题让我们能对那些通常不会放在一起思考也不会比较地区视角下探讨的不同形式的暴力进行宏观观察。

战争的趋势

按照乌普塞拉冲突数据项目（UCDP）与奥斯陆和平研究所（PRIO）关于武装冲突数据库^④的定义，武装冲突是指每年至少有25人战争引发的死亡，战争中双方使用了武装力量，而且至少有一方为政府。^⑤ 它将冲突分为3种与独立后非洲相关的主要类型：国家间武装冲突、国内武装冲突与国际化的国内武装冲突。

乌普塞拉与奥斯陆武装冲突数据表明，战争尤其是内战是非洲后殖民政治史的一个重要特征。独立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30个国家（占该地区所有国家总数的约65%）经历了武装冲突。独立后的前30年，内战的基本趋势是稳定上升，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达到高峰，随后开始明显下降（见图1）。自21世纪初期开始，每年平均有8至10场战争，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到中期

① Robert Kaplan, *The Coming Anarchy: Shattering the dreams of the post-Cold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0.

② Jeffrey Gettleman, "Africa's Endless Wars: Why the Continent's Wars Never End", *Foreign Policy*, Vol. 178, March/April 2010, pp. 73-75.

③ Paul Williams, *War and Conflict in Afric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 4.

④ Nils Petter Gleditsch, Peter Wallensteen, Mikael Eriksson, Margareta Sollenberg, and Håvard Strand, "Armed Conflict 1946-2001: A New Datase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9, No. 5, 2002, pp. 615-637.

⑤ 本文选择每年25人的战争死亡这一较低的门槛而没有选择每年1000人的战争死亡，是为了将高烈度与低烈度的战争都包括进来。

数量的一半。不仅在长期趋势方面，而且从战争持续的时间看，非洲内战也有相当大的变化。有一些持续时间很长的战争，比如苏丹与安哥拉的两起内战都持续了20年以上；也有一些仅持续了几年的短期内战，如20世纪90年代早期发生在马里的内战。有些地方战争成了常态，如乍得、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独立后都有多场持续了不同时间段的战争。但总体而言，大部分内战更类似于马里北部的图阿雷格人（Tuareg）与阿拉伯人的冲突，而不是苏丹南北内战。在乌普塞拉与奥斯陆和平研究所的冲突数据库中，64%的非洲内部冲突及国际化的内部武装冲突持续了5年或不足5年；22%的冲突持续了11年或更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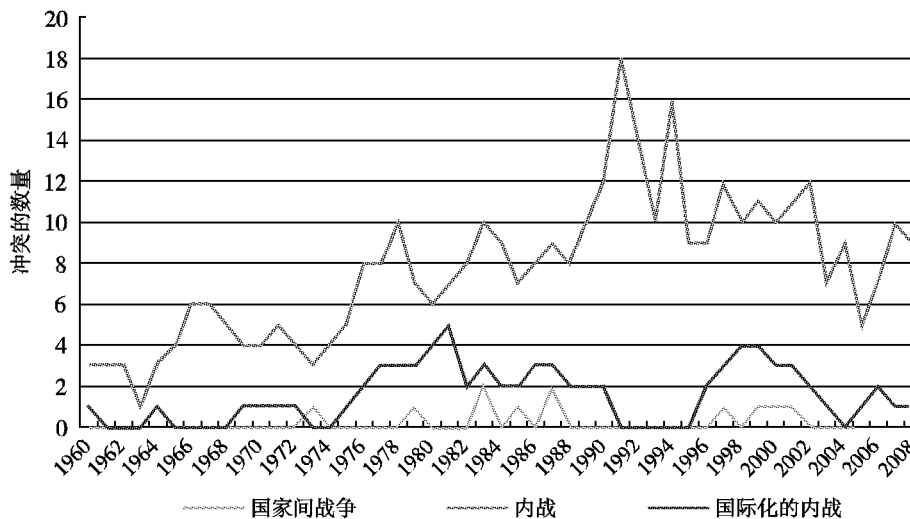


图1 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同类型的武装冲突 (1960~2008年)

比较而言，撒哈拉以南非洲并非是战争最频发的地区，而且非洲发生的战争持续时间与欧洲、亚洲、中东及美洲相比也并非最长。事实上，在1960至2008年期间，亚洲比非洲更频发战争而且持续时间更长。如果我们将战争总数除以每个地区的国家总数，亚洲的平均值是每个国家发生1.8场战争，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数是每个国家1.65场，中东各国平均1.14场战争。尽管在此期间，非洲有最多数量的武装冲突，但其国家的数量也最多，这使非洲每个国家的平均冲突发生率比亚洲低。另外，就内战、国际化的内战以及国家间武装冲突的平均持续时间而言，中东与亚洲比撒哈拉以南非洲要长。事实上，乌普塞拉与奥斯陆和平研究所数据显示，亚洲的战争平均几乎要比

非洲战争持续时间长一倍。因此，与通常的假定相反，从国家平均值看，非洲的战争既非持续时间更长，也非更为频繁。

战争模式的变化

传统的观念认为，就针对平民的暴力、非职业战斗力量的普遍存在、战争的非意识形态目标而言，非洲的内战更为野蛮。这就是所谓的“新战争”（New Wars）论。^① 威廉·雷诺（William Reno）关于非洲战争演化的研究总体上支持了这一观点。^② 如果说厄立特里亚或南非的自由战士代表了冷战期间叛军的面孔，那么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卢旺达的军阀或种族屠杀者则是过去20年的焦点。他们代表了那种武装暴徒——为控制钻石等矿物和获取财富而不惜打仗、使用童子军、从事难以想象的针对平民的暴力，比如剁掉民众的手脚或大规模屠杀。杰弗里·金特尔曼（Jeffrey Gettleman）的描述声称，当今非洲永无休止的战争的发起者是只想夺取现金、枪炮和暴力使用权的残暴掠夺者。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个经验问题，即非洲的战争是不是更加残酷、更少意识形态、比过去更平民化？

我的结论是非洲当前的战争与其他地区相比，只是程度的差别但并非类型的差异。虽然过去20年非洲战争几乎总是对平民极其残暴，但这一差别不应被过分夸大。事实上，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其他地区，内战几乎总是对平民非常残酷。因此，过去20年发生在刚果（金）、乌干达北部、苏丹达尔富尔、索马里及其他地区的战争都充满针对平民的残暴与血腥，冲突中的战斗人员总体而言都不是受过良好训练的“自由战士”。但非洲内战的这些特点并非是全新的。在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叛乱组织一贯将针对平民的暴力作为一种策略来使用。同一时期，还发生了许多国家主导的大规模屠杀民众事件，包括20世纪60年代尼日利亚的比夫拉（Biafran）内战、20世纪70年代乌干达的伊迪·阿明（Idi Amin）与80年代的密尔顿·奥博特（Milton Obote）在位期间发生的屠杀、1972年布隆迪的种族灭绝、亲政

^① Mary Kaldor, *New and Old Wars: Organized Violence in a Global Er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alo Alto, CA, 1999; Stathis Kalyvas, “‘New’ and ‘old’ Wars: A Valid Distinction?”, *World Politics*, Vol. 54, No. 1, 2001, pp. 99 – 118.

^② William Reno, *Warfare in Independent Af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府力量所实施的针对南苏丹民众的毁灭行动。事实上，撒哈拉以南非洲大规模集体杀戮事件的高峰是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有所下降。但当我们仔细观察冷战后的暴行并与冷战冲突中的暴力相比较时，可以发现，其实这只是程度的差别而非类型的差别。

非洲战争性质更大的变化是：为了控制国家政权而开战，或涉及维持对领土长期控制的叛军，以及训练有素的各方军队之间相互开战——此类大规模战争下降了。至2011年，那种两个或更多的纪律严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等级分明的大部队之间彼此征战的大规模战争已经终结。也就是说，21世纪早期战争的典型特点是规模变小了。该时期的战争往往有派系化的分裂的武装叛军；往往发生在国家边缘地带；往往由于流动的派系化的武装组织而难以终结；一般都有明显的跨越国界的特征；叛军的资金主要来自非法贸易、盗窃和国际恐怖主义网络而不是外部大国。

作为例证，我们可以思考一些2005年以来发生的冲突。这些冲突包括乌干达政府与乌干达北部的“圣灵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之间的冲突、乍得政府与中非共和国政府在其东部边远地区打击叛军的战争、埃塞俄比亚政府在欧加登（Ogaden）地区的战争、纳米比亚政府打击卡普里维地带（Caprivi Strip）分裂势力的战争、苏丹政府在达尔富尔（Darfur）地区打击叛乱组织的战争（包括达尔富尔叛乱组织之间的冲突）、马里北部与尼日尔的叛乱、塞内加尔卡萨芒斯（Casamance）地区的叛乱、安哥拉的卡宾达（Cabinda）分离主义运动、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Boko Haram）恐怖活动以及其他武装冲突。这些战争与冲突都是小规模，叛军的数量难以准确估计，但大部分情况下，叛军类似于流动的武装团伙，其成员数量比较少。几乎所有此类战争都发生在国家的边缘地区。很多叛军组织都有变化的派系联盟——达尔富尔、刚果（金）、乍得和塞内加尔都是很好的例子。

冷战后的冲突中，刚果（金）战争可以被视为这一趋势的一个例外，因为在冲突高峰期有7个国家的军队卷入了这场战争。^①但是一旦这些军队撤离后，刚果（金）东部形势就大致符合了这一趋势——小股派系化的武装组织控制着零星的土地、从事着非法贸易、在边缘地区活动，而且给民众造成苦

^① Filip Reyntjens, *The Great African War: Congo and Regional Geopolitics* (1996–2006),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难。所以，即使在刚果（金），虽然在某一时刻其特征似乎不同于正在显现的总体模式，但其实也符合这一变化趋势。另一个可能的例外是2011年4月发生在科特迪瓦的推翻洛朗·巴博（Laurent Gbagbo）的短期战争。但随着在国内尤其是地区与国际层面对巴博一致反对的背景下叛军的推进，而政府军也在撤退，但叛军最终还是放弃了抵抗并与联合国及法国部队进行合作。所以，科特迪瓦其实也没有经历大战，因而也没有超越本文强调的大战终结这一冲突变化趋势。

这一观点的论据还表现在非洲大陆战争死亡人数的下降。在战争中，尽管经常发生民众伤亡，但实际发生的战斗却极少。乌普塞拉与奥斯陆和平研究所的数据表明，在非洲不仅从未出现特别多的战争死亡人数，而且战争死亡人数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图2显示的是年度战争死亡人数除以当年发生的内战数量的结果，由此可以获得每场冲突死亡的数量。^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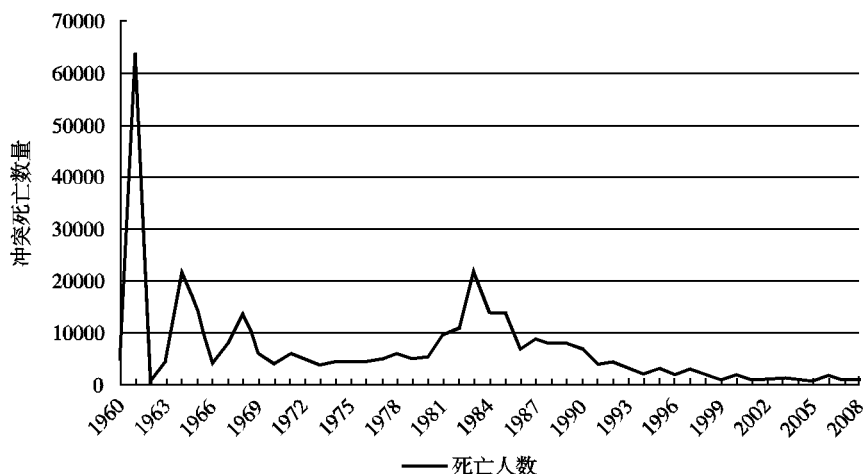


图2 撒哈拉以南非洲战争死亡人数（1960~2008年）

除了发生在国家边缘地区的小规模、派系化叛乱，武装冲突跨越边界的特点也在日益显现。^② 不可否认，冷战时非洲的战争具有跨国的性质。南非曾直接干涉邻国的战争，坦桑尼亚与乌干达于1979年相互开战，同一时期

^① 这些数据是关于内战的数据，而内战是非洲大陆武装冲突的主要形式，但国家间冲突与国际化的内战的趋势与内战趋势是相似的。

^② Idean Salehyan, *Rebels Without Borders: Transnational Insurgencies in World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利比亚军队侵略了乍得。邻国经常为本国的叛乱组织提供掩护和支持。乍得与安哥拉叛乱者各自在苏丹和刚果（金）曾有后方基地。卢旺达爱国阵线则是从乌干达攻打过来的。冷战时期以及冷战刚结束后不久，有许多这样的例子。

然而，一个新趋势是出现了流动性的叛乱组织，他们跨越国界来回游动，牵动多个国家的安全部队，危害多国的平民。圣灵抵抗军是这类叛乱组织的典型。近年来，圣灵抵抗军成群结队的士兵在乌干达、苏丹、刚果（金）和中非共和国之间流动。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是另一个例子，它流动于萨赫勒地区的阿尔及利亚、马里、尼日尔和毛里塔尼亚。甚至基地位于索马里的伊斯兰青年党（Al-Shabab）也在乌干达和肯尼亚开展活动，比如 2010 年世界杯足球赛时发生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爆炸。刚果（金）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战争，虽然规模显然比前文描述的要大，但仍然大致符合这一流动性模式，只是略有不同。在这些案例中，来自卢旺达、布隆迪、安哥拉与乌干达的叛乱组织已在刚果（金）形成了基地。与其他地区的战争相比，区别在于这些近邻国家反过来干涉刚果（金），并且在这个国家待了很长时期。

总之，这些不同的研究结果既挑战了一些关于非洲战争的流行观点，同时也支持了某些观点。一些研究表明，非洲战争的特点发生了重要变化，即从大规模战争转变为活动于国家边缘地带的小规模战争。与此同时，另一些研究发现挑战了那种将内战视为局限于国家内部的观点。非洲的内战日益呈现出跨越边界的特点。研究发现还证实了“新战争”论的一些观点，即后冷战冲突涉及派系化、非职业的叛乱分子和实施暴行的战士，他们更可能对平民施暴而不是彼此打仗。同时，这一特点不应被过分夸大，因为冷战及其之前的所谓“旧战争”也涉及实施暴行的叛军和国家。

大规模杀戮与种族灭绝的趋势

尽管关于非洲大规模杀戮民众的详细数据非常缺乏，但美国政府资助的“政治不稳定任务小组”（PITF）发起了一个过去 60 年大规模杀戮事件数据采集项目。该项目测算了那些在一个连续时间内发生了至少 1 000 人死亡的杀戮事件。因担心数据的质量，而笔者又想只关注更大规模的民众杀戮事件，所

以我将只关注那些据“政治不稳定任务小组”记载至少造成 10 000 民众死亡的杀戮事件。

与其他地区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并非是最易发生大规模杀戮的地区。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大约发生过 20 起大规模杀戮（总计有 46 个国家）事件，而亚洲国家总计 34 个，发生大规模杀戮事件为 22 起，中东国家为 22 个，发生次数为 8 起。因此，无论从相对数还是绝对数看，就大规模杀戮发生率而言，撒哈拉以南非洲都不是领先的地区。

从纵向看，每十年大规模杀戮事件发生率的高峰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20 世纪 60 年代，数据记录了 6 起大规模杀戮，分别是苏丹（第一次战争）、卢旺达、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地区）、布隆迪（1965）、尼日利亚（比夫拉）和赤道几内亚。70 年代有 8 起，包括一些 60 年代开始的战事：苏丹（第一次战争）、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地区）、埃塞俄比亚（德格政治杀戮）、埃塞俄比亚（欧加登地区）、布隆迪（1972）、赤道几内亚、乌干达（阿明）和安哥拉。80 年代有 9 起：乌干达（奥博特第二任期）、津巴布韦、索马里、乍得、苏丹（第二次战争）、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地区）、布隆迪（1988）、埃塞俄比亚（欧加登地区）与安哥拉。90 年代有 6 起：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地区）、苏丹（第二次战争）、布隆迪、卢旺达、刚果（金）和安哥拉。21 世纪头十年有 5 起：刚果（金）、苏丹（第二次战争）、达尔富尔、布隆迪和安哥拉。

这些事件都造成了可怕的人员伤亡，给民众带来了众多苦难。然而，与内战的趋势一致，从 20 世纪 80 年代高峰以来，大规模杀戮事件近年来也出现大幅度下降。确实，如果将数据延伸到 2010 年初，5 个案例中有 3 个已经沉寂下来。也就是说，到 2011 年初，只有达尔富尔和刚果（金）还存在大规模民众伤亡。与大规模战争一样，大规模杀戮与种族灭绝在非洲也处于下降趋势。

其他形式的政治暴力

乌普塞拉冲突数据项目开发了一套非国家武装冲突的数据资料。这一数

据库测算了非国家层面的两个武装组织之间发生的、造成了25人死亡的冲突。^①利用这些数据,鲍尔·威廉姆斯(Paul Williams)算出非洲在1990到2009年间发生了287起暴力事件,大部分发生在刚果(金)、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尼日利亚、索马里、苏丹和乌干达。^②虽然这一数据库很重要且有价值,但它将许多不同环境下的冲突都组合在了一起。其中一些冲突与内战相关联,像索马里、塞内加尔、刚果(金)与苏丹发生的叛军内部之间、部族之间的争斗。另一些冲突发生在劳工组织之间,如南非内部的劳工冲突。还有一些暴力冲突与社区暴力(尼日利亚)、选举(肯尼亚)和资源争夺(埃塞俄比亚)相关。

在这些类型的冲突中,有两种形式的暴力在当代非洲显得特别突出。第一种是选举暴力,即冲突与选举竞争直接相关,发生在选举前、选举期间或选举后的暴力。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因为一党制处于支配地位,选举暴力还很少见(但在独立后的20世纪60年代,少数选举也引发过暴力)。然而由于多党竞争的普遍出现,20世纪90年代见证了选举暴力的增加。鉴于津巴布韦、肯尼亚及科特迪瓦的突出例证,很多非洲研究者认识到选举竞争是充满暴力的。然而,与内战与大规模杀戮研究相比,几乎没有关于非洲选举暴力的频率与水平差异的系统的数据库。

为此,查理斯·泰勒(Charlie Taylor)和笔者一起创建了非洲选举暴力数据库(AEVD),其中测算了选举暴力的发生率、冲突水平、暴力出现在选举前还是选举后、主要行为体是当权者还是挑战者或者二者都是。通过相关数据分析发现,非洲选举的平均暴力水平在1990到2008年间相对稳定,高水平的选举暴力相对稀少,如图3所示。非洲选举暴力数据库使用0~3不同的计分,0代表没有暴力,1代表恐吓与骚扰,2代表定向暗杀,3代表10个或更多的平民死亡。在1990~2008年期间,非洲大约42%的选举没有发生选举暴力,38%有暴力骚扰,各有10%出现暗杀和10人以上的死亡。因此,虽然大约有60%的非洲选举经历了暴力威胁或者更大的暴力,但只有20%的选举出现了高烈度的暴力。鉴于选举暴力趋势相对稳定,而多党制竞争依然是常态,预计这种政治暴力可能将持续存在。

^① See http://www.pcr.uu.se/research/ucdp/datasets/ucdp_non-state_conflict_dataset_, 2012-01-25.

^② Paul Williams, *op. cit.*, p.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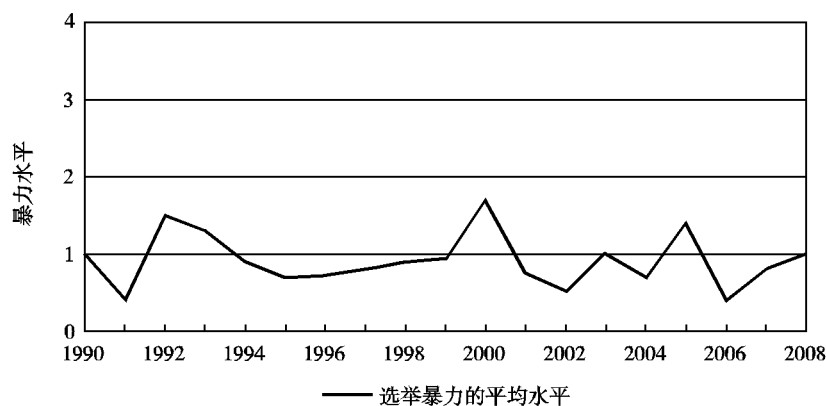


图3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选举冲突（1990~2008年）

第二种比较突出而且可能持续存在的政治暴力是围绕生存资源获取的本地化暴力，例如农牧民冲突。关于这种暴力的发生频率与持续时间的跨国与历史纵向数据都很有有限，这主要是因为基于事件的数据库如乌普塞拉数据库只记录死亡人数在25人及以上的事件，而这些冲突常常导致低水平的伤亡率，如一个或两个人死亡，尽管这种暴力冲突可能上升为更加暴力的战争。然而，基于国别的证据表明，围绕资源获取的破坏性暴力可能持续存在并十分严重。^①

跨国数据资料库也支持了国别的证据。一个最近可以获得的数据库即“非洲社会冲突”（Social Conflict in Africa），记录了国际新闻报道中提及的暴力冲突的发生率（见图4）。数据库记录了新闻报道是否提及食物、水、生存或环境退化作为冲突的根源。虽然关于非洲乡村的国际新闻报道的质量与深度不敢恭维，但收集所得的数据证明了围绕生存资源的冲突数量在增长。^② 很难知道这些冲突最近更大的发生率是不是对这一现象关注增加的结果，当然这反过来也会导致对此类冲突更多的关注与报道。但关键在于，国别证据和跨国证据都表明，围绕关键资源的暴力冲突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暴力形式，值得更多的经验与理论关注。

^① See Mark Moritz, “Understanding Farmer-herder Conflicts in West Africa: Outline of a Processual Approach”, *Human Organization*, Vol. 69, No. 2, 2010, pp. 138 - 148.

^② [Http: //ccaps. strausscenter. org/scad/conflicts](http://ccaps.strausscenter.org/scad/conflicts), 2012 - 01 -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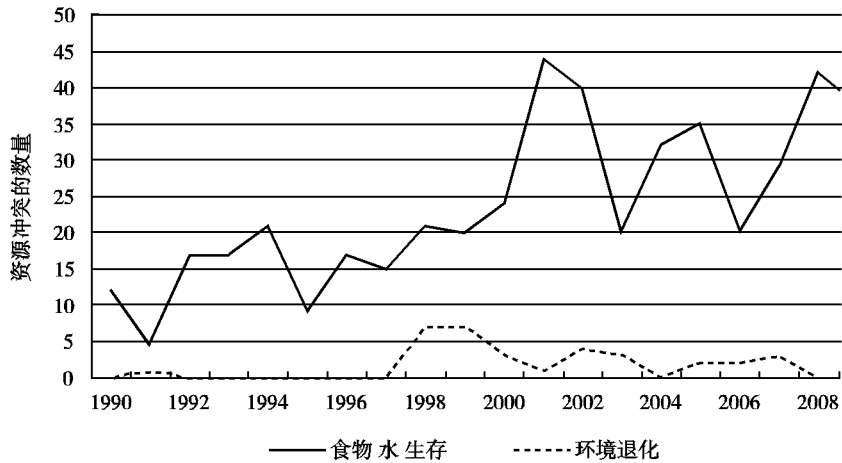


图4 撒哈拉以南非洲生存资源暴力(1990~2009年)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些不同形式的暴力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发生因果互动。例如在肯尼亚、津巴布韦和科特迪瓦的选举暴力中,土地获取是发生暴力的一个关键要素。在内战中,如刚果(金)内战,对本土资源的争夺已经致使冲突双方在战争语境中竞相宣称本土身份。^①戴维·莱丁(David Laitin)和詹姆斯(James Fearon)报告声称,在他们的内战跨国数据库中的所有族群内战中,几乎1/3的导火索源于“土地之子”(Sons of the soil)的冲突,即将自己视为具有本土身份的地区群体与移民群体发生的冲突。^②这些发现表明不同形式的政治暴力是相互关联的,如战争和大规模屠杀那样。这些关联性也应该得到更多关注。

困惑与理论

如何解释非洲内战的减少以及由大规模内战向较小的更加边缘化的内战之转变?这一变化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大部分解释内战发生的主导理论都特别关注累积性的或经久不变的国内变量,如脆弱国家、复杂的地形、石

^① Morten Boas, “‘New’ Nationalism and Autochthony: Tales of Origin as Political Cleavage”, *Africa Spectrum*, Vol 44, No. 1, 2009, pp. 19-38.

^② James Fearon and David Laitin, “Sons of the Soil, Migrants, and Civil War”, *World Development*, Vol. 39, No. 2, 2011, pp. 99-211.

油和高价值的矿藏以及社会不平等。^① 这些变量具有说服力，它们单独或共同解释了许多非洲内战的发生。然而，这些因素无法充分解释非洲内战的急速下降及其变化的特点。

国内因素诸如强社会、一贯的经济增长或者强国家是解释这一变化的很好的候选变量。但是借鉴关于战争的全球模式的一些研究成果，^② 笔者强调地缘政治转变，包括对叛军外部支持的减少，多党选举的推进、冷战后对冲突预防与调解投入的增多以及中国的崛起。

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是支持非洲叛军与镇反的政府的主要资金来源。从非洲之角到南部非洲，超级大国的对抗意味着政府与叛军可以获得武器、军事训练、意识形态培训和外交支持。冷战结束时，一些在冷战期间接受外部支持的国家开始变得比较脆弱，如门格斯图（Mengistu）统治的埃塞俄比亚、西亚德·巴雷（Siad Barre）统治的索马里，蒙博托（Mobutu）统治的扎伊尔以及萨缪尔·多伊（Samuel Doe）统治的利比里亚。由此类推，一些在冷战期间接受资金支持的叛军组织也变得虚弱，如安哥拉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同盟（UNITA）。但在其他一些地方，冷战的结束为一直在等待适宜的时机发起叛乱的反对派武装组织创造了机会之窗，如卢旺达和马里。因此，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目睹了战争的增长，因为交战方看到了发起或解决冲突的新的条件与机会。

但此后，战争的频率下降，战争的特点也发生变化。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叛军从外部获得武器、训练、顾问支持和意识形态培训的机会更加罕见。虽然还有苏丹之类的国家支持叛乱者（比如圣灵抵抗军）扰乱其邻国，但对拥有组织化的战斗部队的叛乱者和在野政府的大规模国际支持陡然下降。非洲大陆新的叛乱组织发动叛乱并生存下来，主要是由于他们获得了矿产资

^① See James Fearon and David Laitin,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7, No. 1, 2003, pp. 75 - 90; 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fler, "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 56, No. 4, 2004, pp. 563 - 95; Lars - Erik Cederman, Nils Weidmann, and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Horizontal Inequalities and Ethnonationalist Civil War: A Global Comparis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5, No. 3, 2011, pp. 478 - 495; Frances Stewart ed., *Horizontal Inequalities and Conflict: Understanding Group Violence in Multiethnic Societi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② Stathis Kalyvas and Laia Balcells,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echnologies of Rebellion: How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Shaped Internal Conflic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4, No. 3, 2010, pp. 415 - 429.

源，或者是因为他们所反对的国家十分脆弱。但这些叛军并未壮大成那种冷战期间或冷战刚结束时发展起来的组织严密的游击队。

冷战结束后另一个相关的变化是多党选举制的兴起。尽管非洲的选举常常有各种缺陷，但选举领域的开放确实吸引了潜在的叛乱者从隐蔽的丛林走向政治舞台。从潜在叛乱者的观点看，多党选举制的开启意味着政府至少名义上可接受外部批评与影响。而且，国际资助的重心转向了支持选举和公民社会组织。对有天赋的反对派人物而言，政治舞台的开放，加上国际资金援助流向的变化，有力地吸引着他们从战场走向国内政治舞台。

过去 10 年继续存在的许多叛乱都是反制度叛乱。叛军领导者试图改变基本的游戏规则，如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伊斯兰青年党、圣灵抵抗军和纳米比亚与塞内加尔的分离主义势力。换句话说，这些残留的叛乱组织不可能通过选举实现他们的诉求，因为他们寻求根本不同的政治体制。即使在科特迪瓦，开始于 2002 年到 2010 年继续发酵的叛乱其实与操纵选举竞赛直接相关。当 21 世纪头十年早期一部分人口被断然排除在选举竞争之外时，当 2010 年当政者试图取消选举结果时，叛乱就发生了。但总的来说，科特迪瓦的叛乱者并非旨在推翻巴博政权，而是要推进包容性选举。

冷战后地缘政治的转变目睹了另外两个相关的变化。一是中国在非洲大陆日益增长的存在。在非洲及其他地区，中国的对外关系哲学是不干涉国家内部事务。事实上，虽然中国对非民主国家提供支持以获取资源，但从当前的证据看，中国并没有资助叛乱者。^①这也意味着冷战后的另一个转变，即叛乱者获得支持的机会变小了，小的叛乱发展为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降低了，并且为反派人物安守于国内政治空间创造了动机。

二是后冷战时期冲突解决与冲突遏制的国际与地方机制不断强化。在非洲，有 3 个机制非常突出。第一个是联合国维和机制。过去 20 年联合国非洲维和的任务规模和执行技术方面都大大进步。过去 10 年，几乎每一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部署都有《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更具强制性的授权，相比之下，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及其之前一直处于支配地位的联合国宪章第六章的授权则非常有限。第二，非洲地区机制在增强。非盟与非洲次地区组织如西非国家

^① See Jonathan Holslag, "China and the Coups: Coping with Political Instability in Africa", *African Affairs*, Vol. 110, No. 40, 2010, pp. 367 - 386.

经济共同体在预防武装冲突方面表现出更大兴趣。^①此外，很多情况下，非洲的杰出人物充当了临时性的和平大使。例如，在肯尼亚 2007 ~ 2008 年的危机中，科菲·安南是一个关键的调解人物；在科特迪瓦 2010 ~ 2011 年危机中奥廷加 (Raila Odinga)^② 和 5 个非洲国家首脑表现相当积极。南非在解决非洲冲突中发挥着日益积极的作用。杰里·罗林斯 (Jerry Rawlings)^③ 成为一个资深政治家。虽然批评者质疑这些行为体的实效与影响，但总的来说，他们的存在比以前时期对非洲国际关系的影响更大一些。最后，国际刑事正义机制比以往更强，已经从对卢旺达和塞拉利昂的临时性特别法庭发展到今天的国际刑事法院。^④ 可能有人对鼓吹者关于其强大遏制效果的言辞持谨慎态度，但这些机制的引入确实与战争的下降趋势是一致的。

总的来说，这些机制中每一个都以限制战争的方式影响了非洲决策者的动机，尽管有时影响很小。它们可能并不是在每个案例中都起作用，但他们指向了一个冷战结束以来出现的更强大且正在巩固的国际冲突限制机制。这一观点显然需要更多的经验检验。但将这些因素放在一起，连同冷战后内战的机会与动机的减少，我们有证据解释过去十年非洲战争频率与特点的变化。

结 论

政治暴力一直是非洲后殖民政治史的基本内容，但并非只有非洲容易发生暴力。实际上，考虑到非洲的殖民史、脆弱国家、种族差异以及经济禀赋，我们可以预期非洲可能发生比事实所发生的数量更多的内战和大规模杀戮。非洲战争并未终结，但最近的趋势是战争频率的陡然降低和战争性质的变化。在 2011 年本文写作之时，非洲大陆几乎没有任何大战。那些继续存在的战争一般都是活动在国家边缘地带的派系化叛乱者的战争。这些叛乱组织不占有

① Alex Bellamy and Paul Williams, "The New Politics of Protection? Cote d'Ivoire, Libya,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7, No. 4, 2011, pp. 845 - 870; Thomas Bassett and Scott Straus, "Defending Democracy in Cote d'Ivoire: Africa Takes a Stand", *Foreign Affairs*, Vol. 90, 2011, pp. 130 - 140.

② 肯尼亚时任总理。——译者注

③ 加纳前总统。——译者注

④ Victor Peskin, *International Justice in Rwanda and the Balkans: Virtual Trials and State Cooper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大量的领土，只有数量不多的武装分子，而且表现出很强的跨国关系特征。鉴于这些特点，应该可以预期，这些以派系化、边缘化的叛乱者为特点的小型战争将持续存在。叛乱者将很难被打击和遏制，他们的派系化性质也为谈判解决冲突带来了困难。很多叛军组织还坚持我所说的反制度要求。最后，笔者还指出，迄今关注相对较少的新的政治暴力（即选举暴力与生存资源争夺的暴力）可能在未来继续存在。与其他政治暴力一样，这两种新型政治暴力都应该有更多的经验与理论研究。

政治暴力模式的宏观变化，尤其是大战的陡降，构成了一个现有文献不能做出很好解释的重要分析难题。笔者认为，外部的地缘政治变化解释了战争频率与性质的变化。笔者尤其认为，冷战的结束大致断绝了叛乱者与国家开展代理人战争的资金来源。虽然从短期看（20世纪90年代），这为旧冲突的解决或新冲突的发生打开了机会之窗，但是，变化趋势意味着有利于装备精良、组织严密的军队发动大战的条件减少了。冷战的结束创造了选举竞争的新机遇，因而也为反对派领导人创造了通过非军事方式争夺权力的动力，从而将他们的雄心与资源从基于丛林的战略转移开来。其他两个相关的变化巩固了这些动力。第一个是尽管中国在非洲大陆影响上升，但至今并没有为叛乱提供支持。第二个是冲突预防与调解的国际与地区机制的强化。所有这些假设都应该得到更多的验证，而不只是本文中的叙述性解释。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研究过去并非预言未来。强师劲旅参与的大战在非洲可能再爆发，大规模杀戮与种族灭绝事件的频率也可能再次上升。当前，非洲大陆的几个地区依然动荡不安，包括但不限于刚果（金）东部、苏丹、索马里、萨赫勒地区的马里北部和尼日尔。但如果最近的趋势继续发展，如果最近的地缘政治变化解释了最近的趋势，那么我们应该可以预期从大规模武装冲突向小的边缘性战争的持续转变，大规模杀戮的继续下降，死亡较少但十分重要的其他形式的政治暴力像选举暴力和生存资源暴力的持续存在。这展示了一个后冷战非洲暴力依然真实存在的画面，但这一形象与永无休止的本地特有的战争形象有极大差异。关注非洲的学者与决策者应该都认识到这一经验事实。

Wars Do End! Changing Patterns of Political Violence in Sub – Saharan Africa

[US] *Scott Straus*

Abstract: Contrary to common assumption, major forms of large – scale organized political violence in sub – Saharan Africa are declining in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and the region is not uniquely prone to the onset of warfare. African civil wars in the late 2000s were about half as common compared to the mid – 1990s. The character of warfare has also changed. Contemporary wars are typically small – scale, fought on state peripheries and sometimes across multiple states, and involve factionalized insurgents who typically cannot hold significant territory or capture state capitals. Episodes of large – scale mass killing of civilians are also on the decline. That said, other forms of political violence that receive less attention in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are increasing or persistent. These include electoral violence and violence over access to livelihood resources, such as land and water. While primarily descriptive, the article posits that geo – political shift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re a leading candidate to explain the changing frequency and character of warfare in sub – Saharan Africa.

Key Words: African Wars; Political Violence; Electoral Conflict; Resource – related Conflict

(王学军* 编译)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

* 本文编译者王学军系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曾为尼日利亚艾哈迈杜·贝洛大学 (Ahmadu Bello Univerisity) 访问学者。